

交易成本的复杂性与公司治理的演化

陈平

原载于：Chen, Ping. “Complexity of Transaction Costs and Evolu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Kyoto Economic Review*, 76(2), 139—153 (2008).

译文发表于：陈平，“交易成本的复杂性与公司治理的演化”，《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浙江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办），2010年第1辑，pp1-26.

摘要

公司治理的不同议程凸显了交易费用观点和产权理论的局限。自上而下的监督和控制可能有损于企业的竞争力。交易费用和代理费用所勾画出的机械图景源于公司理论的极端还原论。交易成本为零的科斯世界隐含着劳动分工的发展会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即摩擦散热的假设，这既违反了热力学定律，也和工业化经济体发展的历史趋势背道而驰。演化经济学主张企业本质在于创新，方能更好得解释多样化的公司治理方式和企业文化。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多种所有制并存下的实践，对于研究产权变革和公司治理的生命周期提供了新的启示。企业的生存更大程度上维系于选择机制的产生和自身的适应能力。

关键词 交易成本，公司治理，选择机制，生命周期，演化热力学

一、引言

公司治理是拥有多维目标的复杂问题。在不同的阶段上，大企业中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给企业带来的机会和挑战是不同的。公司治理牵涉到包括所有者、经理、职工、供应商、债权人、社区和监管者等有着不同利益的团体。它显然是一个典型的适用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领域，所研究的是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权力制衡，如何塑造一个演化中的组织的形态。在演化过程中，想要确立公司治理结构和市场表现的简单对应规则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基于最优化理论的金融经济学对公司治理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未经验证的主张。他们的立论根据来自于制度经济学中两个很有影响力的学说：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科斯 1937，1960，阿尔钦和德米塞斯 1973）。实际上，用这两种理论分析企业和制度所带来的问题远比他们所能解释的问题多。科斯理论，产权理论和金融经济学中相互冲突的观点凸显了均衡观念的局限性和用演化视角在理解经济复杂性的优越性。从方法论上讲，交易费用及其变体代理费用的概念，仅对没有创新性竞争的封闭经济才有意义，而演化视角是处理充满创新和变革的开放经济中的问题的有力方法。复杂科学的兴起给演化经济学研究经济复杂现象提供了新的工具。

在这篇短文中，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讨论公司治理问题：首先，公司治理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和交易成本产权理论的根本缺陷。第二，科斯的零交易费用理论的重大误区。第三，多样化的公司治理经验，尤其是中国的转型试验。第四，基于演化视角的关于产权变革的生命周期理论，作为目前均衡理论的替代。

我们将会看到自上而下的监督和控制可能有损于企业的竞争力。交易费用和代理费用所勾画出的机械图景源于公司理论中的还原论。交易成本为零的科斯世界，隐含着劳动分工的发展会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即摩擦散热的假设，这既违反了热力学定律，也和工业化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背道而驰。演化经济学主张企业的本质在于创新，这能更好地解释多样化的公司治理和企业文化。企业的生存更大程度上维系于选择机制的出现和自身的适应能力。

二、公司治理中没有解决的问题

公司治理问题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政治维度，另一个是经济维度。在产权多元化的情况下，如何在一个企业的股东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分蛋糕即所谓利润，是一个有关权力制衡和游戏规则的政治问题。我们应当将此问题交给政治经济学。我们的讨论将集中于经济维度：在公司治理问题上，从经济竞争的角度我们能知道些什么？

《OECD 公司治理原则导言》（2004）中说：

“公司治理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绩效，提高投资者信心的一大要务……好的公司治理能够激励董事会和管理层追求有利于公司和股东的目标，并且有利于有效的监管……其结果是，企业的资本成本得以降低，鼓励企业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公司治理的框架应该与法治的原则相符，并且使监察、管制和执行机关各司其职。”

OECD 原则确实为国际资本市场的开放做出了很大努力。但其“促进经济增长和绩效”的说法在理论和实践中并没有坚实的基础。实际上，它的真实动机是“提高投资者信心”，特别是国外投资者的信心。在经济学理论中，与增长和绩效有关的几个问题值得讨论。

首先，金融经济学目前并没有对市场有效性的客观度量。根据金融理论中的有效市场假说（EMH），如果市场波动以布朗运动为主的话，市场的有效性可以被市场的不可预测性来评判（Fama 1970, 1991）。然而，EMH 被色混沌的发现所挑战，基于非稳态分析的经验观察表明，大约 70% 的股市波动是色混沌即非线性内生振荡而非布朗运动（陈平 1996）。基于大数原理的经验分析表明商业周期的微观基础是微弱的。市场波动的主要来源，既不是消费者、也不是生产者，而是金融中介（陈平 2002）。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一系列金融危机，比如 1987 年的股市崩盘，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2 年的网络泡沫就是历史证据。行为经济学家强调正反馈的交易策略和腐败造成的内部冲击，宏观经济学家则关注诸如国际投机资本流动之类的外部影响。显然，金融市场是最复杂的和管制最多的市场，存在巨额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科斯本人以为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很小，我们的观察相反，金融市场的监管成本极高，是交易成本为零的科斯世界的一个反例。

第二，何种市场制度模式为最优？是否有向某种制度模式（例如英美模式）收敛的历史趋势？目前经济学界没有共识（Hall and Soskice 2001）。在金融市场上，美国企业的价值通常被高估，而德日企业通常被低估。在宏观层面上，美国有持续的贸易和预算赤字，而德国和日本有持续的贸易盈余。美国的消费过度 and 储蓄不足，可以部分归结为金融创新导致的信用扩张，以及美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霸权。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经济模式强调股东的利益，而德国、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给予利益相关者更多的重视。

第三，即使在企业层面上，也不存在经济有效性的最优选择。情人眼中出西施。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在现实中比在理论中复杂很多。对于一个有远见的创业者来说，寻求在创新和产品上的行业领军地位是他的长期目标，而小股东们则更喜欢中期甚至是短期内的分红或收益。经理们操纵财务报告来提升自己的股票期权和社会地位，而工人更关注工作稳定和

社会保障。产权理论暗含着对单个或大投资者的利益偏向。反其道而行之的保护小投资者的政策却与增强金融市场的信心息息相关（Shleifer and Vishny 1997）。

第四，对透明的市场的要求忽视了信息模糊和经济复杂的基本事实。市场透明只在不考虑经济复杂的信息对称的合作博弈中有意义。在非合作博弈下，人们有动机在市场竞争中制造虚假信息和保护战略信息。在持续的商业周期运动中，信息的扩散和扭曲都会放大市场的敏感度和市场的不稳定性。近来安然公司的倒台和次贷市场的崩溃，表明有监管漏洞的市场中，信息博弈和信息模糊的普遍存在。所谓的透明市场，其实施的成本和收益取决于市场制度的选择规则（对谁透明？为了谁的利益透明？），其结果对于不同的参与者并不相同。

第五，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至今思路混乱。人们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困惑不解。有些西方观察家指责亚洲的裙带资本主义，认为是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但是，更多经济学家认识到，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波助澜的金融自由化，带来的过度投机和外国势力的渗入危险更大。韩国在 IMF 的压力之下开放了金融市场，结果外资在韩国企业的股份迅猛增加，其中包括在顶级的韩国公司的股份。显然，这里的问题并不是什么经济绩效，而是公平的国际秩序。

第六，公司治理可能有损于企业文化，导致长官意志。过度监管会摧毁企业内部的共同信任。短期内减少代理成本的行为会带来长期内的合作成本的增加。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司治理在资本全球化中，是增强投资者信心的重要事项，但其与经济成长与绩效的关系并不明确。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检查公司理论和组织发展的理论基础，也就是交易成本学说和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和代理成本理论都受到了交易成本概念的深刻影响（阿尔钦和德米塞斯 1973，法玛和詹森 1983）。它们只是对企业中交易成本的层次和形式的认识上有所不同（Jensen and Meckling 1976）。科斯认为真实世界中交易成本很小，因此管制和政府的作用应该最小化。产权学派认为交易成本在现实中很大，法律和制度的初始建设是否合理就非常重要。但是他们逻辑的共同基础是基于成本竞争的片面观念，他们只考虑封闭经济下的交易成本，无视创新竞争带来的变化。我将在开放经济的演化动态中揭示他们这种观念的重大误区。

三、科斯交易费用观点的基本问题

科斯提出为什么交换市场中存在企业这样一个根本问题（科斯 1937）。威廉姆森发现了一些与垂直整合有关的重要机制（威廉姆森 1979）。企业存在于工业生产的多层结构之中的组织结构。至少有三个层面对于企业存在是必不可少的：企业之上宏观层面的市场和环境，企业之下微观层面上的生产单位和个人。然而，科斯既不像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那样对市场和社会的大环境感兴趣，也不像钱德勒那样去研究工业组织（钱德勒 1992）。科斯把交易费用作为分析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这比生产原子的层次还低。

科斯的观点有点像 19 世纪末期物理学中奥斯特瓦尔德(Ostwald)的唯能论。该理论将能量转换而非物质结构作为认识世界的基本框架，宣称分子和原子是不必要的假设（Holt 1970）。奥斯特瓦尔德后来公开宣布放弃自己的理论，因为实验证明了爱因斯坦布朗运动的分子运动论。科斯理论是一种极端的还原论，他的交易成本说没有任何经济复杂和历史的观念。这是所有以交易费用为基础的均衡理论的根本缺陷。具体而言，交易费用的观点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企业规模的问题是一个企业生态学的问题，涉及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不是只有一个层次的静态力学问题。对于科斯来说，企业规模完全由交易费用和合作成本之间的内部平衡来决定，而竞争对手的行为和市场规模对企业毫无影响。这种头脑简单的理论与常识不符。人们知道由于可得资源的限制不同，海洋里最大的动物（蓝鲸）比陆地上最大的

动物（大象）要大（Schmidt-Nielsen 1984, O'Neill 1989）。同样的道理，今天的跨国公司比工业革命早期的英国企业要大。著名的斯密定理指出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Stigler 1951）。捕食者在生存压力下，其规模与捕食技能必须与猎物的状况相匹配，竞争性企业也是如此。组织规模的变动可以通过动态系统中稳定与复杂的权衡来认识（May 1974 陈平 2005）。与此相反，内省的交易成本论从古典经济学的机械的框架出发，只考虑市场中的摩擦。因此，交易费用的观点不能把握市场经济的生机特征，比如企业规模的变动以及合并与分拆的浪潮更替。科斯和威廉姆森声称垄断企业是竞争性的和有效的。近来的经验表明即使传统的汽车产业，也在将自己的零配件外包以应对激烈的创新竞争。戴尔和联想能够打败 IBM 等计算机行业中垂直整合的巨人，主要是因为这些创新型企业，具有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技术的灵活性，这正与威廉姆森的论调相左。在一个有限规模的市场中与创新型对手竞争，交易费用并不是关键的因素。公司战略与公司文化，比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的生存更重要。从方法论上讲，基于资源的企业理论与现代产业的现实更相符（Penrose 1959）。与此相反，科斯理论无视市场环境和竞争挑战，纯属闭门造车的理论乌托邦。

第二，科斯忽略了企业竞争中交易费用的双向运动。这种双向运动与基于成本分析的单向思维不同。在一个没有快速增长和技术变革的成熟市场中，用直销和垂直整合的办法来减少交易费用不失为一种良策。然而，在一个快速增长和不断创新的新兴市场中，增加广告投入和外包非核心部门，虽然增加了交易成本，仍可能成为制胜之道。与此类似，代理成本理论忽略了在劳动分工不断发展的情形下，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积极意义。因此，成本因素在一个企业兴衰不定的开放经济中，虽然可能重要，但不一定是最关键的因素。价格/成本竞争在新古典经济学和交易费用观点中占有统治地位，它们所针对的是没有创新的传统市场中的问题（熊彼特 1934，钱德勒 1992）。医生不会只测量病人的排泄物多少来判断病情，他更要检查病人的身体功能和病理结构。

第三，科斯没有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分工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历史视野。当已有商品的市场扩张时，运输和通讯成本相对于原有的本地市场必然增加。虽然技术进步能使单笔交易的成本下降，但是根据物理学定律，交易成本的下降必有极限，它一定大于零。市场扩张和技术进步使劳动分工复杂化、网络化，总能源消耗的增加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这从工业化以来的全球变暖中可以看到。在市场博弈中，存在大量的形象扭曲，信息捏造和信息噪声。没有市场监管，竞争会成为一场破坏性的游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社会交易费用在美国是增加的，1870 年大约国民产出的 15%，到 1970 年达 50% 多（Wallis and North 1986）。宣称没有监管的市场竞争会使交易费用降低，这一科斯幻想缺少工业化的历史证据。

第四，科斯式的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违反了物理学的基本定律。科斯定理认为不管初始条件如何，体制变革能够收敛到一个最优的体系（科斯 1960）。他的论述建立在将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与物理上无摩擦世界的类比上，这是完全错误的（科斯 1988）。无摩擦的惯性运动是科学的理论，可以由现实中的行星运动很好地近似，这一点已经由上千次的卫星发射得到了证实。但交易成本为零在现实中不存在。依据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信息交换所需的最小能量必然大于零。科斯在认为市场竞争过程会降低交易费用的信念还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生命和组织的诞生是一个非均衡的过程（Prigogine 1984）。交易费用是能量的无规则形式，等价于物理学中的废热或熵。伴随着工业社会日趋复杂，能量和原材料消耗日增，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交易费用也随之增长，劳动分工的发展只能是个熵增的过程。技术进步可能改变熵增的速度，但到目前为止，没有观察到改变熵增的趋势。这是非平衡系统的特征。。收敛过程的均衡趋势意味着封闭系统中的热寂(heat death)也即生命的绝灭。而生命世界中非均衡的多样化趋势，则由开放系统中演化热力学产生，其代价是必须不断消耗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在这个意义上，交易成本为零的科斯世界，其实是一个没有温差和热耗散的永动机，不可能有生命存在。

第五，科斯即使在均衡的意义上也没有解决企业的边界问题（Holmström and Roberts 1998）。从演化热力学和复杂科学的角度看，企业的产生类似于生命的起源，其特征是选择性边界的出现，例如细胞膜。是由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交互成的一种非均衡的秩序。

总之，科斯的交易费用及其变体代理费用理论，只是抓住了片面的静态元素，却忽视了整体的动态图景。他们只从内部观察企业的视角，来自于对非合作博弈中人类本性的负面认识，以及企业结构上的还原论。在企业家才能、创新、战略和企业文化问题上，均衡的经济分析没有用武之地。科斯一度批评主流经济学是“没有人性的消费者，没有组织的企业，没有市场的交易（Coase 1988, p.3）。”套用他自己的说法，交易费用理论所呈现的仍旧是一幅“没有好奇心的消费者，没有复杂性的企业，和没有演化的市场”的失真图景（Nelson and Winter 1982, Cyert and March 1992, 陈平 2007）。我们需要一个认识多样化公司治理形式的更好的视角。

四、中国在公司治理上的经验

1990年代初，Alan Blinder 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和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Blinder 1990）：

“关于日本挑战美国产业领先地位的著述可谓连篇累牍。但奇妙的日本经济提出了另一项挑战——却几乎没人注意，我把它叫做日本对普遍接受的经济学理论的挑战。说得简单又过于大胆一点，日本人成功是因为他们办的全是错事（从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来看）……研究日本经济使我得到了一个初步的结论：日本式的资本主义，跟传统西方经济模式相去甚远，以至它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系。（例如，日本人把生产者放在消费者前面，把国家建设放在股东的利润前面。日本的经理们主要追求的是长期的目标，而不是股价上升带来的短期利润。日本企业在发展和研究上更合作而非只有竞争。日本的贸易不是自由的，而是有管理的开放。日本工资差距与美国相比很小，员工流动则更稳定。）”

当然，经济学界对于日本模式的信心，由于日本长达 10 年的发展停滞而减弱了。美国的公司治理方式在 1990 年代被引入日本。经过 10 年的试验，只有 2% 的日本上市公司采取了美国式的董事会制度，平均每个日本公司的独立董事只有 0.8 个。与此同时，关联企业的交叉持股等方式却被大量采用，以应对美国式的恶意收购。许多日本企业把公司文化而不是公司治理当做国际竞争的主要武器（Hirota 2007）。了解了日本的经验之后，我们来讨论一下中国最近的转型试验，看看我们从公司治理的研究中能学到些什么。

中国在改革前后试验了各种公司治理模式，包括主要在国防工业实行的苏联式的中央集权的指令经济，经理层和员工收入差别不大的公司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参与管理的南斯拉夫模式，利润留成的匈牙利模式，灵活使用员工（不对裁员加过多限制）和给管理层股权激励的美国模式。科斯理论和产权理论在中国改革中影响相当显著。一个引人注目的表现是进行了“产权清晰”的国有企业改革，给在国有、集体、私营、外资多种所有制下激励机制的实行铺平了道路。令人吃惊的是，所有的模式包括家庭联产承包制都只适用于某些方面和某个阶段，没有一个模式是在任何时候、或所有地区都适用的。以下几个因素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治理模式和组织形式。

第一，巨大的人口压力，使城市和乡村都把为过剩人口创造就业放在效率之前作为首要任务。这本质上给公司治理加上了生态的限制。在转型中通过大批裁员来获得经济绩效从来都是最难以接受的办法。这就是所谓的预算软约束的根源，这在中国今天的私有化企业和前苏联东欧国家都普遍存在。

第二，巨大的地区差距给任何集权政策和统一的法令的施行施加了严格的限制。这使得西方式的法治很少市场，而地方和从国有集体企业发展起来的企业，都要求有力的领导班子，对领导力的需求在中国各地区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尽管那些地方和企业的领导者未必有清晰的产权界定。

第三，越来越复杂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使得多样化的公司治理和产权安排并存。没有一种模式能主导所有产业。比如，个体经营在小农场和技术简单的小企业中很成功，而集体农场和乡镇企业，由于规模经济的原因在中等的农场和企业中更有竞争力。对大型企业来说，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在人力资源、先进技术、和资金来源上都有比较优势。这里，所有制结构对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来说不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许多美国商业模式在中国转型和试验过程中被引进和检验，在一定的限制下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首先，在航空和通讯领域打破国有垄断是一个促进竞争的有效手段，但由于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竞争的合理强度或产业集中度仍是有待讨论的问题。第二，提高劳动力的灵活性（比如，打破铁饭碗或终身制）最初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接着产生的过高的跳槽率又成了损害企业竞争力的新问题。许多企业重新考虑德国和日本与工人分享福利的模式来吸引高技术的工人。第三，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改善了国有企业的形象，但中国管理层的职位与企业的股票价格没有关系，从而对新上市企业的股市表现影响甚微。第四，管理层收购在国有企业重组中对中小型国有企业而言收到了效果，但其在大型国有企业的推行由于公众反对受到极大阻力。显然，公司治理不是一个只用金融市场股格可以测量的简单优化问题，而是一个牵涉到生态、文化和政治约束的多维问题。

中国在公司治理上的试验，给产权和公司治理理论提供了一些新的启示。1990年代乡镇企业的崛起给传统的经济学家很大的震撼，因为乡镇企业既无缘先进技术和原料保障，又没有银行信贷的支持。它的优势来源于集体土地所有制下，低成本的劳动保障和灵活的市场策略。地方政府在给乡镇企业贷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因为新成立的乡镇企业几乎没有抵押品、信用记录、和风险投资，但地方官员对乡镇企业带头人的能力，有更多的私人信息，可以协助银行提高信用度。

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企业的崛起，同样令西方观察家不解。在东欧和前苏联，技术比中国先进的国企，要么被跨国巨头收购，要么破产。中国的新兴企业，多以强有力的领导层和鲜明的公司文化为共同特征，在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方面则各式各样。引人注目的例子是：长虹从一个军用雷达厂转型为电视机厂。哈飞是一个闯入汽车制造业的国有航空企业。联想是从非盈利的中国科学院分立出去的企业，后来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部门。海尔在1980年代是一家濒临破产的地方国有企业，而后在家电市场异军突起。吉利汽车是一家从乡镇企业起家的私营企业。奇瑞汽车是由一个落后省份的中等城市的市政府创立的。它们的快速发展以强有力的领导层（美国模式）和鲜明的公司文化（日本模式）为特征。它们的共同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产业竞争力和增加市场份额。它们的快速发展不是基于所有者对管理的控制，而是创业经理对员工的股权和收益激励。

芝加哥的诺奖金融经济学家 Merton Miller 曾经在上海的国有企业改革研讨会上有一番深刻的评论（Miller 1995）：

“产权固然重要。但产权体系没有最优解。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特征是短期行为，投资不足。德日模式的特征是长期行为，投资过度。”

我们知道 MM 定理指出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融资结构无关（Modigliani and Miller 1958）。它同时暗含了公司的价值与所有权结构无关。我们对于中国实验的观察似乎更加支持 Miller 的分析，而不是产权理论。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MM** 定理和产权理论都是采用均衡论的视角。为何二者在公司治理上立论差别如此之大呢？显然，线形近似来自于对非线性曲线的分段近似。非均衡现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用均衡现象近似描述。问题是哪种近似方式与实际观察最相符。由于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难于定义和度量，科斯的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在本质上都是规范理论，而非经验理论。**MM** 定理成立的条件是无套利机会，或者竞争性金融市场中的线性定价。非线性定价（亦即价格歧视、或对完全竞争的偏离）是否存在是一个实证问题。在这个意义上，**MM** 定理，对于理解公司治理的复杂性，比交易费用的观点更有分析和操作上的价值。

公司治理的核心思想，是在公司管理上自上而下的控制。很快人们就发现，物质激励本身不能换来经理层和员工的忠诚与合作。历史上中国的政治和商业文化中有两种占统治地位的品质：领袖风范和兄弟义气，这与西方建立在个人主义和游戏规则基础上的竞争有显著的差别。儒家的价值观更适用于合作竞争。因此，将相关者的利益放在股东的利益之上，是任何企业在中国的市场竞争中生存的要素。

西方的观察家也许会认为，国有银行的巨额坏账是国有制企业缺乏效率和政治体制腐败的主要证据。实际上，中国的商业银行从来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提供了大量低息贷款给改革初期的那些刚起步的企业，却并没有像西方的风险投资那样要求高回报。西方风投的成功率一般是 10%。而中国国有银行的平均坏账率仅为 30%。中国过去 30 年中，GDP 年增 10% 而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这一事实说明，中国的国有银行为技术更替所引起的创造性毁灭提供了国家保险。中国在多种所有制下实现了快速增长和平稳转型，而东欧和前苏联遭受了严重的衰退，其产值在过去 10 年中下降了 40% 以上（陈平 2006）。在最近的股市繁荣中，中国三大国有银行的市值堪比美国在世界排名领先的私有银行。这说明投资者对中国经济表现的评价比主流经济学家高。显然，市场规模与发展前景（而不是苏东早熟的产权体系下的裁员和衰退），在提高中国公司的股市价值时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

基于上述观察，我将在下一节中提出一种替代性的演化产权的生命周期理论。

五、企业发展的生命周期理论和社会演化的对称破缺

马歇尔指出经济学应该更像生物学而不是力学（马歇尔 1920）。我们假如把企业作为动物看待，它们有从婴儿期、老年、到死亡的生命周期。我们提出组织变革的生命周期理论。我的观察既是实证的，又是历史的。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纲要：

第一，企业的创立和生存主要取决于能否创造价值，而不是降低交易费用的能力。熊彼特对企业演化有更深刻的洞察。企业的起源意味着时间和空间的对称破缺，是一个不可逆的非均衡过程，而科斯定理意味着消费和投资的对称。（陈平 2007，张五常 1998）。

第二，选择性边界的产生是企业生存的先决条件。有了选择性边界，才能吸收有用的资源、排出无用的垃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结构分化是为了适应本地的环境，即市场生境 (market niche) 或生存空间。平衡态统计物理学中的马克斯韦尔妖的选择功能，可以通过领导和管理得到实现。最终，是选择机制（而不是成本结构），决定了企业的创造力和竞争力。企业合同条款的设置，在公司治理和激励机制两者之间是不对称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企业的目标而不是给员工提供保障。

第三，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或产权结构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是不断变化的。

新成立的企业往往有远大的梦想，而缺乏资金和人力资本。它们的起步资金主要来自 3F: 家庭、朋友甚至是“冤大头” (family, friends, fools)。理想主义，兄弟情义和集体力量，使弱小的梦想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成长。在初始阶段，没有哪个私人资本敢去支持未经证实的美梦。因此，来自非盈利大学的技术转让和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对早期的研究和发

展是至为关键的。新成立的企业经常在一个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的情况下开始运作。和科尔奈的“软预算约束”的理论相反，在充满了未知风险的新兴市场中，初始资本的预算软约束，即使对有竞争力的企业而言，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并非企业亏损的原因。

起步后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事情发生了变化。各式的产权结构，诸如合伙制，公司制，私人企业和上市公司等，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组织形式的选择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技术的复杂程度、固定资产的规模、和变化中的市场环境。

在竞争者较少而技术大概稳定的情况下，垂直整合或许是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的办法。对于处在竞争者较多而技术变革很快的行业的企业，最好是将非核心的部门外包而专注于核心部门。即使在发展的成熟期，相对于风险控制和激励机制等考虑，交易成本的计算也很难衡量（张五常 1969）。战略决策的制定很少考虑交易成本问题。

对于一个亏损的或者夕阳行业来说，预算软约束问题会重新出现，因为在减少损失还是让亏损企业再做一次更新尝试之间很难事先估计后果。在这个意义上，基于“预算硬约束”学说的无差别的紧缩信贷的行为，会在宏观层面上带来更大的社会不稳定。国家主导产业的重组政策对产业转型至关重要。为了企业的生存和长期利益，董事会的控制权应该在多维目标的指导下清楚地界定，而不只是简单追求短期内公司市场价值（股东权益）的最大化。

第四，流布甚广的信息对称下公平竞争的幻觉，导致了市场监管中去追求公平交易的乌托邦，这与现实差距甚远。任何一种劳动分工的创新，都将带来人类社会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权势不对称。各种“创造性毁灭”形式，例如进入门槛、专利保护、国家边界、文化歧视和战争的根源，都源于权势不对称。对市场生机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在创新和可持续性之间艰难地保持平衡。科斯定理最误导人的天真想法，就是基于对称性假设，例如排污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对称谈判地位，消费和投资的对称假设等（科斯 1960，张五常 1998）。如果谈判地位过于悬殊，谈判双方过于敌对的话，通过自主交易的方式解决污染等利益冲突问题可能是不可行的（陈平 2007）。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可持续的市场，需要立法对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方进行不对称保护。新制度经济学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的财富分配不对称，导致权势不对称的基本原理。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的均衡战略，只考虑自由化和私有化，忽视了自身竞争力的培养，在东欧和苏联的推行，只是为外国资本霸权的进入铺平了道路。这一观察同样适用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总之，产权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变革，是动态演化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变革的动力来自变化中的宏观市场环境和产业技术。在一个技术更替的开放经济中，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压缩成本的策略是行不通的。

六、结论

公司治理问题主要基于发展成熟期的大企业，存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美国经验，与尚在成长期中的新兴企业关联不大。一些诸如会计准则和独立董事的做法，能够促进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但有关公司治理和经济绩效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演化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和产权理论，提出了有关企业内部合作的诸多有趣问题。但是基于降低成本（交易成本或代理成本）的均衡观，不能理解企业创新的本质和组织变革的演化机制。日本公司文化的经验和中国多种所有制的成功，给理解组织发展的选择机制和产权结构的生命周期提供了新的启示。演化的视角对理解多样化的公司治理和企业的兴衰，提供了全新的框架（Dopfer 2005, 陈平 2005, 2007）。

致谢

作者感谢张五常, Joseph Stiglitz, David Kennedy, Yagi Kiichiro, Yuji Aruka, Werner Pascha, Zhengfu Shi, Chang Liu, Ziyuan Cui, Weisen Li, Haizhou Huang, 盛洪, 唐方方, 韩琪, 黄凯, Huayong Zhou 的讨论, 也感谢 2006 年 7 月由中国改革设计(China Task Force) 曼彻斯特会的与会者, 和 2007 年 9 月京都东亚经济治理问题国际研讨会的参与者。最后感谢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 07BJL004 号的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 [1]Alchian, A. and H. Demsetz (1973) "The property right paradigm,"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1): 16-27.
- [2]Blinder, A. S. (1990) "There are capitalists, then there are the Japanese," *Business Week*, Oct. 8, pp.21.
- [3]Chandler, A. D. (1992)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industrial enterpris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6(3): 79-100.
- [4]Chen, P. (1996) "A Random walk or color chaos on the stock market? - time-frequency analysis of S&P indexes," *Studies in Nonlinear Dynamics & Econometrics* , 1(2): 87-103.
- [5]Chen, P. (2002)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the laws of probability theory: the principle of large numbers vs. rational expectations arbitrag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49(4): 327-344.
- [6]Chen, P. (2005) "Evolutionary economic dynamics: persistent business cycles, disruptive technology, and the trade-off between stability and complexity," in K. Dopfer ed., *The evolutionary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chapter 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pp. 472-505.
- [7]Chen, P. (2006) "Market instability and economic complexity: theoretical lessons from transition experiments," in Y. Yao and L. Yueh eds., *Globalis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Chapter 3, World Scientific, Singapore, pp.35-58.
- [8]Chen, P. (2007) "The symmetry assumption in transaction costs approach and symmetry breaking in evolutionary thermodynamics of division of labor," CNPE Working Paper, June 30.
- [9]Cheung, S.N.S. (1969)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with special application to Asian agriculture and the first phase of Taiwan land refor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10]Cheung, S. N.S. (1998) "The transaction costs paradigm," *Economic Inquiry*, 36(4): 514-521.
- [11]Coase, R.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16): 386-405.
- [12]Coase, R. H. (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1): 1-44.
- [13]Coase, R. H. (1988)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14]Cyert, R. M. and J. G. March (1992) *A behavioral theory of firm*, 2nd Ed. Blackwell, Cambridge, MA.
- [15]Dopfer, K. (2005) *The evolutionary foundation of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 [16]Fama, E. F. (1970)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s: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mpirical work," *Journal of Finance*, 25(2): 384-433.
- [17]Fama, E.F. (1991) "Efficient capital market II," *Journal of Finance*, 46(5): 1575-1617.
- [18]Fama, E. F. and M. C. Jensen (1983)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6(2): 301-325

- [19]Hall, P. and D. Soskice (2001)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K.
- [20]Hirota, S. (2007) "Corporate governance or corporate culture," RIETI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column, Oct.12.
- [21]Holmström, B. and J. Roberts (1998) "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m Revisite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2(4): 73-94.
- [22]Holt, N.R. (1970) "A note on Wilhelm Ostwald's energism," *Isis*, 61(3), 386-389.
- [23]Jensen, M. C. and W. H. Meckling (1976)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4): 305-360.
- [24]Marshall, A. (192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 Porcupine, Philadelphia.
- [25]May, R.M. (1974) *Stability and complexity in model ecosystem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 [26]Miller, M. H. (1995) Speech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a's state own enterprise reform, July 16.
- [27]Modigliani, F. and M. H. Miller (1958)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8(3): 261-297.
- [28]Nelson, R. R. and S. G. Winter (1982)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 [29]OECD (2004) *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 [30]O'Neill, R.V. (1989) "Perspectives in hierarchy and scale," in S.A.Levin ed. *Perspectives in ecological the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 [31]Penrose, E. T. (1959)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 Sharpe, White Plains, NY.
- [32]Prigogine, I. (1984) *Order out of chaos*, Bantam, New York.
- [33]Schmidt-Nielsen, K. (1984) *Scaling: why is animal size so importa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 [34]Schumpeter, J. A. (193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 [35]Shleifer, A. and R.W. Vishny (1997) "A Survey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e*, 52(2): 737-783.
- [36]Stigler, G. J. (1951)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9(3): 185-193.
- [37]Wallis, J. J. and D. C. North (1986) "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1870-1970," pp.95-148, and "Comments" by Lance E. Davis, pp.149-161, in [38]Engerman, Stanley L. and Robert E. Gallman eds.,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Studies on income and wealth, vol. 5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39]Williamson, O. E. (1979)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2(2): 233-260.

Complexity of Transaction Costs and Evolu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PING CHEN

(Fudan University &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Conflicting agenda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show the limits of the transaction costs approach and property rights theory. A top-down approach of control and monitor may have negative effect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firm. The mechanic picture of transaction costs and agency costs is rooted in reductionism of firm theory. The Coase world of zero-transaction costs is contrary to the law of thermodynamics and historical trends of industrial economies. Diversified pattern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culture can be better explained by the creative nature of the firm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China's experiments under mixed property rights during economic transition shed new light on life cycles in changing ownership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survival of a firm is more associated with the emergence of selective mechanisms and adapting ability.

Key Words: transaction costs, corporate governance, selective mechanism, life cycles, evolutionary thermodynamics.

JEL Classification Numbers: G34, K00, B52

【葛飞译，陈平校， 2010年3月9日】